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超越后殖民理论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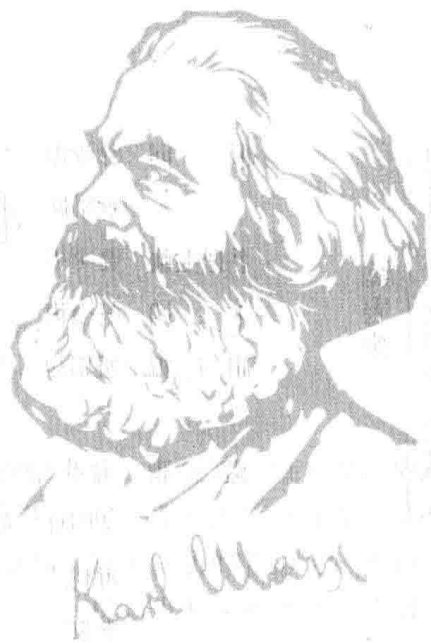
[美] 小埃·圣胡安 (E. San Juan, Jr.) / 著

孙亮 洪燕妮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超越后殖民理论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美」小枪·圣胡安 (E. San Juan, Jr.) / 著

燕妮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后殖民理论 / (美) 小埃·圣胡安著; 孙亮, 洪燕妮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2-0

I. ①超… II. ①小…②孙…③洪… III. ①后殖民主义-研究 IV. ①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5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超越后殖民理论

[美] 小埃·圣胡安 (E. San Juan, Jr.) 著

孙亮 洪燕妮 译

Chaoyue Houzhimin Li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5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題。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致 谢

自我翻译卢卡奇英文版的著作（1973年于纽约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余载。虽然经历了冷战期间的跌宕起伏，但是伟大革命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事实上，这些思想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部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我们能否将这种实践理解为一种激进的“理论实践”抑或一种统一的联盟活动？首先值得一提的以上问题或是我讲座内容的一部分，或是我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又或是我基于敌手的利益以及竞争机制所带来的机遇的情境下对该问题的重思。毋庸置疑，此处的许多主题和论点是我早期研究著作的再续，其中包括“激进形式主义”“改革、霸权和越界策略批判”“菲律宾的诱惑”。

以上主题和论点大多为在菲律宾尤其是在奎松城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及菲律宾大学的各个学院（遍布马尼拉市、怡朗市、米亚高市和碧瑶市）和万丽市国际管理学和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研究对象。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索雷达·雷耶斯教授和露露·托雷斯教授、菲律宾大学的埃尔默博士，另外感谢国际管理学和经济学学术中心的托马斯·塔尔勒杜教授、罗兰·森布兰教授、威利格思教授和该中心主任桑托斯等人盛情邀请我到该中心讲座。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同道，来自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的吉尔万纳博士和马克博士，感谢他们在1995年5月的特兰托英语研讨会上与该会成员分享我的想法。另外，我还要感谢达特茅斯大学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研讨会“多元文化想象”的发起人唐纳德·皮斯。本文的第二章及其他章节的很多内容的构思得益于与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交谈。感谢在冷战期间给予我莫大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他们是：爱兰·沃尔德（密歇根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杜克大学）、詹姆斯·本尼特（阿肯色

大学)、罗伯特·汤布洛斯基(纽约大学研究生中心)、布鲁斯·富兰克林(拉特格斯大学)、山姆·诺莫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尼尔·拉森(东北大学)、胡·德哈特(科罗拉多大学)、W. F. 豪格(柏林自由大学)、保罗·布勒(纽约大学)、唐纳德·韦斯林(加州大学)、曼宁·马拉布尔(哥伦比亚大学)、罗格·布雷斯纳汉(密歇根州立大学)、兰西和诺曼·钱斯(康涅狄格大学)、吉姆·兹韦克(锡拉丘兹大学)。特别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凯伦·古尔德主任和州立鲍灵格林大学伦理研究会主席迈克尔·马丁教授的鼎力支持。最后,非常感谢迪莉娅·阿吉尔勒(州立鲍灵格林大学)、埃里克·圣胡安(芝加哥大学)和阿吉尔勒·圣胡安(布朗大学)等人的宝贵意见。本书的一切失误皆由本人承担。

感谢马丁出版社所有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莫拉·E·伯内特,其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和销售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本书某些章节已在一些刊物或丛书中发表过,其中包括《联邦文学》《道路和目标》《亚洲周刊》《左派思潮》《精灵》《亚太研究论文集》(杜克大学)《迪里曼评论》《菲律宾资源中心纪事》《论争》等,在此向以上刊物或丛书的编辑们致敬。

序 言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一种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新学科和学术产业也随之兴起^[1]，一般来说，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为彰显文化研究和人类科学等中心议题提供了契机。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制度权威应当关注知识审慎、权力监督和文化预判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同一性、内在差异的多元逻辑和与之相关的独特性、暂时性显得尤为重要；阿里夫·德里克在其《后殖民氛围》（1997）一书中，全面探究了主体与历史的问题；历史理性、价值和结构转变等话题为如今学界热衷讨论的“道德观”“身体观”“欲望观”所覆盖和取代。冷战后的民族国家间的联盟在权力上发生了转变，国际关注点从共产主义的整体主义、民族冲突、劳工移民和妇女贩卖等话题转移到日益兴盛的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上（这里仅针对时事问题），这在无形中加重了人类学课题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负担。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仍旧坚持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一来，便加剧了新保守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向之风越发强劲，譬如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传统学科的标准和优先性，八九十年代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和生态保护运动、和平倡导运动以及女权运动形成了如今我们称为“文化战争”的用词。^[2]

随着在苏联及其周边官僚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采用掠夺性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有人开始猜测整个社会变得空荡荡，自由对一切即兴创作开放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反核运动团结一致，以防以邻为壑的个人主义、宗教主义和新世纪原教旨主义和反动主义，由此一来改革工作和解放议程被暂搁下来。在这个过渡期，“跨文化学”的概念开始呈现，这使得移民居住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未来。暂时性成为一个模棱两可且“没有目标的行动”领域。根据情境主义观点，国际处于一个没有进步的发展状态。霍米·巴巴（Homi Bhabha）及其他学者从迪士尼工厂废墟和

生态灾难中召唤出来的“第三空间”的概念同样显得模棱两可和杂乱无章。

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阐明一种新的关系逻辑，即多元性逻辑下的公共边境和跨界居住等新概念。然而，剥夺人权的情况并未消失。后现代主义厌恶普遍性用词，更不用说整体化了。解构主义的“自由”领域不能容忍启蒙运动进步和解放的叙事方式。令人好奇的是，在解构主义的告诫中，拒斥本质主义以致破坏权力话语并以非对称结构取而代之的诉求并没有使得我们在后殖民考验中遭遇任何非正义的统治抑或对统治的实际抗拒（这个论点同样适用于作为题为“离散化”与“次要化”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英国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笔下深度描写的英国窘境与贫困的南方所处的后殖民危机留给我们思索的问题在于随机的统一性和拜物教，这种统一性和拜物教似乎永远遵循着一种不确定性。后殖民主义（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对一些人来说，它确实一定程度上向个体妥协，它为机会主义的蓬勃发展留下了余地。

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文学现象，这种现象只限于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人。殖民经历，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欧洲殖民主义促使世界划分为核心工业社会和周边欠发达的社会，同时它实现了文艺复兴与现代在人类史上的划分。然而，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据列宁称）的出现孕育着其自身的消亡。巨大的危机和灾难笼罩着我们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社会：世界战争和革命，包括反革命运动（尤其是苏联等国家社会的衰退）。如后现代主义一般，后殖民主义经由南方“买办知识分子”而实现（Appiah 1992），它做出了感性的划时代的转变，过去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反映了预期中对抗的“感觉结构”[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修饰法]的突变。国际解放运动的失败尤其实现了现代与过去完全的决裂，过去，应验了霍布斯那句话，是“肮脏而残忍”的，然而它却并不短暂。

在评论这种认知转变之前，我想把后殖民主义置于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概述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的框架内加以讨论。这个危机以“由平均利润率的减少引发的资本积累过剩和商品生产过剩”（1995：438）为特点。为了增加平均利润率，更精确地说是平均剩余价值率（即雇佣劳动的剥削率），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努力引入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化），并且不断创造和满足社会积累条件以适应主要以构造一个“二元社会”进一步破坏第三世界工人阶级为主的工薪一族的社会凝聚力（Figueroa 1997，参见第六章相关讨论）。这些人群包括年轻人、失业

者、少数民族、移民、妇女等等。自二战之后，“后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僵局仍然存在，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长期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使得南方的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联合国报告，大约有10亿后殖民统治下的居民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每年有1600万名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二战时期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及孟加拉饥荒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曼德尔号召人们关注帝国主义的野蛮对环境和世界健康状况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中包括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化问题”。

4 以上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立场出发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洛杉矶市区的重建表明真正后殖民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它集中体现了全球化程度的参差不齐性。对此，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主流文化体现在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上，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指出，瓦尔霍勒斯齐（Warholesque）建筑风格的转变，如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酒店和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e）酒店的建筑采用了以下两种混合元素：当前寄生于资本主义危机中新国际资本循环和全新的阶级分化导致城市改革理念的破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种族和民族性更为浓厚：1992年洛杉矶城市暴乱正预示了以上趋势的蔓延。

在此，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未来正化身为当前的社会情境。如今值得我思考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跨国企业集团（鉴于自身不可通约的差异性）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它们的强强联合，这一点也正是后现代/后殖民艺术家和批判家们所致力要澄清的问题。但这些艺术家或批判家们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自身没有办法弄清决定社会变迁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不仅发生在社会边缘，同时也发生在社会中心。



洛杉矶从一个落后城区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环太平洋经济金融中心（虽然其造船业处在南加州难以控制的房地产通货膨胀，但其国防工业仍然蓬勃发展）。急剧恶化的城市基础建设及随新浪潮而来的近100万的亚洲、墨西哥及中美洲非法移民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后现代资本主义并非如詹姆逊所预言的最终将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后现代资本主义却能厚颜无耻地去回忆城市开发最原始粗糙的形式。（M. Davis 1985: 110）

不仅如此，戴维斯提到在半径为几英里的后现代酒店里，至少存在 10 万名包括儿童在内来自不同国家的受超级剥削的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这般重组不仅预示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还预示了随着由多民族城市无产阶级的超级剥削而诞生的绝对剩余价值所带来的“原始积累的复归”（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四章中展开讨论）。拉丁美洲艺术家科科·富斯科（Coco Fusco）于 1992 年出演的《两个未被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访问》就揭示了当今的“返祖”现象，他将这种联系定性为“晚期封建社会”（1995：24）。这种回到“原始积累”的做法实质是在抹去了其殖民记忆的叙述中使自身得到理解。

一本以唯物史观为真理导向的文集写道：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系统，其发展是不均衡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策略决定了其“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则。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同的生产模式以短暂性和“上层建筑”效应使得整个市场实行了重新配置（Jalee 1997；Nabudere 1977；Brewer 1980；Wallerstein 1983）。我们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地区，其都市中心统治了周边领土和人民。殖民主义及随后的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大量地将完全相异的经济与政治整合成相关联的文化，此种殖民中心支配着现代性的尺度。二战以后，随着技术交往的完善化以及交通便利化，前殖民主体加速了向大都会的移民速度，从而实现了“异构”语言的统一化以及中心与边缘的日常生活行为的均质化（Featherstone 1990）。我认为，后殖民主义既作为这种混合且多层次的文化逻辑，是晚期现代性的反映，同时也是殖民权力与被殖民权力统一化（城市化）的逻辑。

后殖民谱系的争论可追溯到以发展不均衡状态否定历史因果关系的做法。尽管“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后交往主义或后革命主义）具有不可分割性，但是后殖民主义可追溯到帝国西部内陆地区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的逃离和移民潮的兴起。该争论以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对西方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第三世界”的浪漫理想主义的质问为发端。在阿罕默德充满挑衅的《理论上》一文中，阿罕默德反对詹姆逊“国家寓言”的概念，他区分了为去殖民化运动所抵触的社会形态的书写方式与流行于“第一国际”所钟爱的物化与原子化书写方式。不管承认寓言与否，阿罕默德和詹姆逊都扩大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超验意义和目的。阿罕默德坚信这些寓言并不表明“第三世界”文化实践的多样化。此外，阿罕默德还对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提出质疑，阿罕默德尤其质疑萨义德将马克思主义从后殖民批判中清扫出去并隐晦地妥协于资

本主义的一般意识形态的做法。

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阿罕默德（1995a）转向质疑由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两人提出的“后殖民文学政治”的概念。斯皮瓦克和霍米是后殖民理论的两位领军人物。阿罕默德哀悼后殖民理论否弃历史，尤其否弃人类生存和发展轨迹的历史。尤应谴责的是，这种理论呈现出的折中主义，有时甚至对资本工具化规则一知半解：“在这一语境下盲目沉醉于一体化的跨国文化、偶然的政治实际上相当于认可超越资本本身的文化主张……至今我们对如何评价电子文化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殖民文化和跨国文化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这种文化有可能造成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腐败和全球人口比例的降低以维持野蛮的生存状态，更不用提电子文化和电子部件给人带来的影响了。”（1995a：12-13）阿罕默德将这种现象与不加选择的相对主义合称为“文化差异主义”，该理论的预设建立在各种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它不为任何客观标准所证实或证伪，同时该理论还披露了与晚期资本主义共谋的后殖民政治的目标在于维护有色人种的霸权统治（Ahmad 1995b）。

后殖民学说承认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文化差异的现象的本体论优先性。这种处于内外空间的差异体之间的关联产生了一致的交互体：“在差异体重叠与置换处出现了间隙，即民族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的经验、协商的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Bhabha 1994b：1-2）自从资本民族实现了劳动分工和一体化之后，各种差异现象也相应产生（Wallerstein 1991）。但是，对霍米而言，后结构主义的“书写差异”涵括了各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社会科学（Memmi 1965）。在某些特定的关系结构和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体：“后殖民移民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上大迁徙的叙事、农民与原住民的社会迁徙、诗人的驱逐、大批的政治和经济难民的遣散等等”（Bhabha 1994b：5）。柯林尼克斯（Callinicos）把霍米的方法称为“理想主义的社会还原法”（1995：111；see also the wide-ranging essay by Parry 1994）。不确定性、困惑性、无限变化性、转化和协商构成了后殖民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特征。除了上述讨论的后殖民主义对历史参照系的模棱两可以外，尼尔·拉森（Neil Larsen）还指出神秘话语体系中的后殖民假说阻碍了后殖民布道者进一步下如此尴尬的结论：“作为历史产物的资本民族和资本民族主义既不是历史的起源，也不是历史的归宿。”由此一来，后殖民假说要么走向古典历史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文化现代性阈限”（1995b：15）的反历史学道路。霸权集团和下属部门组织间的客观权力和资源十分不对称，其造成的后果是大城市和“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

7

之民族性的消失。

在这场关于政治异质性和同一性的辩论中最突出的是主体问题，即具体的历史情境下阐明的改革意向问题。而这些关键之处（见第一章、第三章和第五章内容）被正统的后殖民主义忽略。正统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比尼采的无政府主义更加激进（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然而这些思想却是有问题的，尤其对有色人种寻求社会认同和原住民传统来说。将贯穿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政治经济上的剥削的事实还原为话语权和互文性的做法实质上是取消了主体和集体主义对生活产生的影响。超越性的差异政治为霸权批判和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的物质实践所取代。

8 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思·格里菲思（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后殖民研究读本》的笔记中，三人声称后殖民理论否认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叙述手法，其中涉及进步概念的发展、本质主义的主体性、目的论等等。加雷思·格里菲思等人同意后现代主义消解帝国主义中心/边缘二分的话语体系的目的，由此一来他们就衍生出后殖民主义的政治主体这一概念。然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主体学说并不仅仅指代一种历史过程的理论，而且还指代一种辞藻华丽的修辞游戏。对此，最致命的一点在于后现代主义以一切基础和客观的正当性将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并阻碍对全球发展不均衡和压迫的抵抗运动为由对其加以拒斥。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局部知识、半机械人、边境脚本（borderland scripts）等口号遮盖了跨国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实践泯灭人性的本质。后殖民话语体系产生于“第一世界”的学术界，它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

后殖民修辞学已贸然地剥夺了底层者的话语权（详见第三章），即使在说话者选择沉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将其视为前瞻性的颠覆模式。毕竟，语言立场可以作为一种斗争武器；语言恰恰由多重音节（multiaccentual）构成，这是因为说话者沉默不语意味着其内心无声音节从四面八方传来构成该种不语的状态。这种内心的共鸣构成了欲言不能的话语的呈现、抑制到脱口而出的整个迹象。蒙太奇的和谐音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托马斯·阿列亚（Thomas Alea）令人难忘的电影《不发达的记忆》大幅采用了这种蒙太奇手法，该电影以导弹危机为尾声，电影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塞尔吉奥（Sergio）做了如下忏悔（“这个岛是个陷阱……非常昂贵的尊严”），与此相对应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哀泣：“我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保持正直也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主权。”（1990：95）以“交互性”来标榜这一时刻将可能永远错失这一刻，因为